

《太平广记》所见唐都长安的经济意象

张林君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00)

摘要:唐都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来被文人墨客争相吟咏,长安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人们广泛关注。《太平广记》是了解唐都长安的珍贵史料,其相关小说故事展现了长安城中人们的经济活动。从城市经济的角度看,这种社会生活风貌呈现出长安繁荣兴旺的经济意象。《太平广记》主要记载了长安的商品交易与经营,包括动物交易、奢侈品交易、日常生活用品经营、银行业经营、旅店业经营、酒肆经营等,从中可以看出长安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逐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皆所积聚”的交易市场和广泛多样的商业经营对象。

关键词:《太平广记》;唐代;长安;经济意象;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4-0036-6

唐代长安不仅是唐人普遍向往的首都,也是当时域外民族心向往之的“万方朝宗”之地,这在以长安为吟咏对象的唐人诗词歌赋中多有反映。阐释唐都长安的文化意象,学者已经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且已经取得相当好的成绩。不过,就学界已经推出的相关研究成果看,它们多是从文学与建筑学角度对唐都长安的城市建筑布局的“景观意象”进行描述或解析^①,至于以历史的眼光,从城市社会经济视角对“长安意象”进行剖析者并不多^②。基于此,本文拟以《太平广记》为核心资料,通过对其相关小说故事之解读,分析唐都长安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并揭示其蕴含的唐都长安的经济意象,或有益于唐史研究之进一步展开。

一、解说《太平广记》中长安的经济意象

一座城市的意象,正如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所说:“从本质上来说,城市自身是复杂社会的强有力的象征,如果布置得当,它一定会更富表现力。”^{[1]3-4}长安作为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作为“复杂社会的强有力的象征”,远非其他城市可比。可以说,长安意象乃是唐代城市意象的最高代表和集中体现;同时,又因为长安作为首都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其“城市意象”的内涵,又与其他城市有着根本区别。从经济角度看,其实力之雄厚,首屈一指。仅以人口而

论,盛唐时长安常住居民超过100万,在当时的世界上独一无二,如此众多人口的衣、食、住、行,都对长安的经济构成巨大压力,而能够承担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又反证了唐朝长安的城市经济发达程度。

在凯文·林奇的地理研究视野中,“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成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1]2}正如任何物体都不可能体验自己,城市物质形态的可意象性应被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感知,以得到一种达成共识的公众意象,我们对于唐都长安意象的把握就是要尽力体悟当时城市居民感知到的这种公众意象。“迄今为止,我们对城市意象中的物质形态研究的内容,可以方便地归纳为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1]35}如果以唐都长安来看,“道路”为城中大型街道以及诸坊间街道,“边界”可以理解为宫墙、市墙、坊墙和京城外围城墙,“区域”指的是宫城、皇城以及郭城中的坊和市等有范围的地方,“节点”指的是宫门、市门、坊门和城门,“标志物”代表的独特建筑景观就较多,如兴庆宫、大明宫、曲江池、芙蓉园、慈恩寺等。而且,这五种元素类型都不会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关联的,它们不仅构成了长安的形制,而且会与当时社会经济场景中的人发生联系,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在他们的行为中透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共性感知的特性需求,从而呈现唐都长安的社会经济变迁。关于这一点,将于后文依例详述。

收稿日期:2020-04-03

作者简介:张林君,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史。

体会长安意象不仅通过城市建制,这个过程更需要有唐人的活动来填充和丰富,感受长安的经济意象也是如此。作为宋人所编大型类书,《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纪实小说之汇总性文集,也是一部反映唐人社会生活风貌的百科全书,包含大量具有史学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其中与唐代长安及城中坊市、街道、城门等地名位置有关的人的日常活动记载尤多。《太平广记》虽因所收录之神仙鬼怪类故事所占比重最大,故世人每以荒诞不经之传奇小说目之,但“文学即人学”,“小说把人们所能做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一切都变成描摹的对象。小说不但描摹一切,而且把一切都融入人生的故事之中。唯其如此,《太平广记》的价值,亦非小说史的研究所能牢笼”^[2]。无论是高高在上、令世人羡慕之神仙,还是面目狰狞、令百姓畏惧之精怪,实则皆出于人的创造,根本上还是俗世社会的扭曲性或夸张性的映射,显现了当时人心的欲求。因此,透过怪诞无稽之故事表象,完全可以挖掘出背后所隐藏之真实意涵,有助于从另一侧面窥探古代社会历史之真相。在把握长安意象的过程中,正好可以借助《太平广记》中长安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了解唐代长安社会经济情况,利用这些线索进而对唐都长安经济意象有所概括。

二、《太平广记》中长安的商品交易与经营

《太平广记》所载唐都长安经济意象方面的故事甚多,其中尤以反映长安商品交易市场者为多。人们交易的商品种类丰富,经营的行肆形式多样,各类行商坐贾在长安东市、西市、坊间、街道、城门处都可以见到。

(一) 动物交易

唐都长安存在大量活口与大型动物交易,水产、家禽、牛马驴驼等都可以成为交易的商品,供人食用、娱乐与役使。据《太平广记》,太府卿崔公“过天门街,偶遇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3]1125}。在唐代,长安的天门街简称天街,它从皇城的朱雀门延伸开去,是一条南北向的中轴大街,皇帝由此街到达城南祭天。可见,在天门街这样的城市主干道旁也能买到大量食用鱼类。长安设有鸡坊,因玄宗喜欢民间斗鸡戏,以至“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3]3992},可见

斗鸡买卖的疯狂场景。长安还可买卖马匹,《太平广记》载有郑子买马和卖马之事。买马之时,“郑子如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青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卖马之时,先是价格谈不拢,没卖成,后来“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遂卖”^{[3]3695}。《太平广记》关于唐代长安动物交易的情景记载较多,不再赘举。值得注意的是,东西两市是长安主要的商品交易场所,因动物乃活体动产商品,其交易地点相对灵活,街道与坊内亦有交易。

(二) 奢侈品交易

唐都长安以珠宝玉石为主的奢侈品交易极为活跃。起初,经营奢侈品的店铺开在西市,后进入里坊,延寿坊亦成为交易奇珍异宝和汇集玉石工匠之地。在长安,奢侈品交易除了金银等贵金属,还有令人大开眼界的宝物。据《太平广记》,胡人贵蚌珠而轻蛇珠,长安至相寺有位贤者,“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贤者叹服,遂卖焉”^{[3]3739}。还有,某僧人获李林甫所赠“如朽钉,长数寸”的“宝骨”,“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胡人曰:‘此宝价值一千万。’遂与之”^{[3]3251}。延寿坊不仅有金银珠玉店,而且有鉴宝能人,《太平广记》多有记载,此不赘述。

长安珠宝玉石奢侈品交易主要集中在延寿坊,与其宫城坊里布局有关。延寿坊在西市东北方向,再向东是朱雀街,北接皇城,南抵诸坊,且靠近皇城的含光门、朱雀门、安上门,离富贵皇城近在咫尺。唐高宗以后,皇帝迁至皇城东北方的大明宫起居听政,唐玄宗时改至皇城东部的兴庆宫起居听政,所以官僚贵族及宦官争相在皇城以东各坊置办住宅,以为上朝之便。因此,朱雀街以东成为“贵人区”,朱雀街以西更大众化,交易市场相对热闹。延寿坊恰好被东西市、皇城与“贵人区”环绕,且靠近“金光门”——“春明门”(皇城南第一大街)之交通要道,成为除西市外奢侈品交易的不二之选。

(三) 日常生活用品经营

在唐都长安,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可以通过交易获得。有研究者指出:“开元天宝年间商业中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交易种类和交易量都大大增多了,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普通民众卷入商品经济活动之中。”^[4]

先看衣。“缁”和“绢”是当时的纺织产品,可用来制衣。据《太平广记》,王仙客家的仆人塞鸿赎身

为平民后“贩缗为业”^{[3]4003}。扶风窦氏向神巫询问丈夫王愬下落,神巫卜得“(王愬)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3]2883}。可见,私营手工生产已在长安形成作坊,塞鸿和王愬以此谋生,也说明当时市场上这两种纺织品的买卖比较流行。另外,西市有专门卖成品衣服的“衣肆”。据载,郑子寻找任氏,“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3]3693},而任氏“竞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3]3696}。

再看食。在长安,面食饼类生意进入里坊。长安的饼类,包括馒头、馅饼、面条、煎饼等。据载,“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3]3216}除了卖蒸饼的本地人,还有卖饼的胡人。他们在坊内开设饼店^③卖胡饼,如“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饼来。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遂延贺”^{[3]263}。可推知长安面食风格多样,食店也并不都集中在市。“唐郎中白行简,太和初,因大醉,梦二人引出春明门。至一新冢间,天将晓而回。至城门,店有鬻饼钉饬者。”^{[3]2258}在白行简的梦境中,馒头烧饼店开设于城门处,虽然这是梦境,但也透露出在人流量大的城门处开店的合理性,因为春明门是从长安到灞桥最近的城门,是长安与洛阳、扬州等地人们互相往来的必经之门。

再看药品。长安东西市设有药材店铺,也有走街串巷、流动性的药品商贩。据载,一位不知姓名、“多于城市笑骂人”的“卖药翁”^{[3]236},曾到长安街头卖药。实际上,这个被认为是神仙的“卖药翁”,不过是那些掌握一些医技或持有几个“单方”“偏方”的江湖郎中的形象缩影。还有在西市卖药而致富者:“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斲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资金守门,五七日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3]1679-1680}

除上述衣、食和药品买卖外,还有各类便民的店铺。如卖古代典籍的“坟典肆”,李娃愿公子能够重新振作考取功名,带他“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3]3990}。又如,贺知章在坊里见到一个面相不凡的老人,便“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3]263}。钱贯即穿钱所用的绳子,铜钱外圆内方,用绳子贯穿,方便携带与保管。此外,还有西市的秤行^④、麸行^⑤、鞞簪行^⑥、凶肆^⑦等,不一而足。

(四) 银行业经营

唐都长安的柜坊,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柜

坊代客商保管财物以收取柜租,当客商需要用财物时再凭信物提取,为商业买卖提供便利。据《太平广记》,胡人米亮“谓义曰:‘……又西市柜坊,巢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3]1877}。可见,经营柜坊盈利颇大,米亮建议窦义速速买下来。长安另有与柜坊功能类似的场所。据载,“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3]3751},这里的“所”能够凭李的存放物给他兑换现钱,且出钱速度很快,数目多,虽然没有确指“所”是否为柜坊,但是功能类似。某公子住在李娃家,“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僮。岁余,资财仆马荡然”,“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3]3987}。公子将衣物在“肆”当了,否则没有财力筹备祭品。这种“所”和“肆”可能具有“抵押”“典当”功能。

长安能开展典当交易的是“寄附铺”。住在长安胜业坊的霍小玉本是霍王的小女儿,散尽资财苦寻情郎李益的消息,因此生活拮据,“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3]4009},寄附铺类似代人出售旧物的场所。柜坊与寄附铺存在于唐代实物交易与钱币交易的转换时期。官府欲禁断私铸恶钱,交换媒介仍以布帛为重,但元和七年(812)户部王绍等奏闻:“伏以京都时用多重见钱。”^{[5]2103}随着钱币在通流中平衡物价作用的逐渐显现,柜坊又利于商贸,长安发展柜坊与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大,促进了唐代银行业的兴起。

(五) 旅店业经营

唐都长安的旅店设置于四围的城门外,方便出入长安城的人住宿。据《太平广记》,“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3]2248}。邠州在长安的正北,猜想这索泉邸舍在长安以北。长安东边也有旅店,“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3]2005}。“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3]2397}根据怀远里在长安城中的位置及书生和公主第二天就到达来看,关西的旅舍就在长安西边不远处了。秦川富家少年收到一封骗他钱财的信,信中指明了让他去的地点是“出于春明门外逆旅”^{[3]1839},可见春明门外有旅舍。唐德宗建中年间朝中租庸使刘震面对泾原兵变,安排外甥王仙客出长安城,“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谓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

肩锁,南望目断……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炬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辎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3]4002-4003},若城门处火炬光亮与兵士呼喊声都能感受真切,则王仙客逃到开远门外的旅舍离长安城很近,而且这家旅舍能够容纳他的二十馀宝物,看来占地面积很大。

长安的旅店是集多种经营为一体且客流量、信息量大的场所。宰相马周发迹之前,身世凄苦,虽有学识,但不被关注,“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馅媪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馅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3]1719}马周从新丰的旅店辗转到长安,在卖蒸饼女老板的店铺里留宿,后来他想找个做门客的地方,卖蒸饼的女老板帮他引荐给中郎将常何。从马周所住旅店看,至少有以下特点:其一,旅店至少有两个功能,即供人住宿和餐饮;其二,旅店客源从商贩扩大到平民;其三,旅店的客流量、信息量大。这也就无怪女老板熟识常何,能为马周做门客“牵线搭桥”,还被李淳风、袁天纲所遇。由于长安经济兴旺,旅店业如火如荼,故能发家致富,带动其他行业进步。

(六)酒肆经营

唐都长安于邸店经营中还建有酒肆。唐建中三年(782)开始官方榷酒,抑制私人酿酒,但“以京师王者都,特免其榷”^{[5]2130},于是长安酒业发展就拥有了优厚条件。得益于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长安酒肆业格外发达,故长安东、西市中颇多酒肆。据《太平广记》,李淳风预言有七个婆罗门僧人明日将会在西市饮酒,太宗命人去看是否应验,结果不出所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3]479}穆将符纵逸自放,好饮酒,其好朋友姚生在东市经营一间酒肆,穆将符常往来其家“饮酒话道”^{[3]275}。由于长安酒肆众多,饮酒成风,故而有“争如且醉长安酒”^⑧、“曲江宴饮”之类的吟咏。

长安酒肆经营已然突破“市”的规定。如王郾“其年至长安开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复见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3]559},说明长安开化坊中已有酒肆。悬酒招旗的“旗亭”,同样经营酒肆生意。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嫁,住在广化里,“时有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3]1826}。作为居

民区的“坊”,也有酒肆经营,其意义不同寻常,可视为中国古代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坊”与“市”之间已无严格的界限,商业经营开始进入居民区。

综上所述,《太平广记》关于唐都长安商品交易与经营的记叙,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商品交易与行肆经营的种类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其次,行肆经营主题明确精细,经营相同或相近生意的行肆相对集中在一处,甚至产生了某店肆在某坊专营的场面,亦有经营主题可合并兼容的店肆,为人们提供形式多样的一站式服务,如邸店与酒肆联结的住宿餐饮组合。第三,长安商品交易与行肆经营规模有一定变化,其地点从城中的市扩张到里坊与城郊,也不乏行商;有些行业逐步形成完整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的经营链条模式,带动了其他行业资源的流通与整合。

三、《太平广记》中长安经济的特征

通过梳理《太平广记》所载唐都长安商品交易与经营活动,不难发现,长安经济的特征具体表现为逐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皆所积集”的交易市场和广泛多样的商业经营对象等三个方面。

(一)逐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彼时长安劳动力市场有工种叫“短佣”。据载,窦义“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西市买油甃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甃。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捣,候相乳尺,悉看堪为挺,人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3]1876-1877}。可见,这些重复性工作并不复杂,只是有时需要雇用大量人手。除了日佣,也可以月为计。“寿州唐庆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颇极专谨,常不言钱。”^{[3]547}再者,短佣出卖劳力,会获得报酬。如某公子因被李娃欺骗,流浪街头,“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穗帷,获其直以自给……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3]3988}。最后,短佣可在坊内寻找。如辛察同意送黄衫人出城,找一个拉车的脚夫,“(辛)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一力车佣载者,亦常往来,遂与黄衫俱诣其门”^{[3]3073},可见坊内有居民可能就在从事短佣工作。

除了短佣,长安还出现了专业性或行业性的劳动力市场,如长安通化门附近的“车工”汇聚之所。据载:“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

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輶,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者,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輶材,某当并力。主人讶其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洎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锱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3]541-542}可见,长安通化门长店不仅车辆部件的制造和车辆组装皆有相应的定价,而且对所加工的部件也有具体要求。另外,前来应征的工匠手艺精良。通化门附近之所以成为车工汇聚之地,主要是因为这里作为重要交通孔道,每天都有大量车辆出入^⑨。有唐一代,从首都长安通往东都洛阳的官道只有2条,通化门则为南路的起点,凡从长安出发启程前往洛阳或洛阳以东地区,多数都以通化门为始发地;同样,从洛阳或洛阳以东地区前来长安,也以通化门为重要落脚点。出入通化门的各色人等,虽有行脚而至者,但多数还是需要乘坐车马,从而造成对出行车辆的大量需求,带动车辆制造、修理等行业的兴起,进而造成对“车工”的旺盛需求。

(二)“皆所积集”的交易市场

唐都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是所谓“皆所积集”的交易市场。《长安志》卷八“东市”条:“南北居二坊之地。”注曰:“……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6]198}《长安志》卷十“西市”条:“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注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浮寄流寓,不可胜计。”^{[6]240}可见,东、西两市各占两坊面积,市内格局排布相似,市局机构位于市的中心,起到管理市中交易的作用,具体要求“诸市,每肆立标,题行名”^[7],表现出市内分肆列行的形制。

长安东、西二市商贸繁荣,天下货品汇聚于此。据载,“唐丞相兰陵公萧傲,清誉俭德,时所推伏,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3]819}此所谓“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即指长安的珠宝店、药材铺中所陈列的来自南方的货物十分丰富,可见长安虽地处北方,但产自南方的物品,在这里也很容易买到。因为货品种类丰富,大唐皇室亦在东、西二市采买,称为“宫市”。据载,“薛稷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

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白如雪……”^{[3]2627}可见,“宫市”采办的地点,就是东、西二市。薛稷在东市市前见到的坐车妇人,可能是前来市场购物的贵妇。

长安东、西二市不仅是各种商品交易的集散地,而且还是各种人力资源的麇集之所,但凡社会所需之各种手工艺匠人或有特殊技能的人员,都可以在东、西二市找到。据载,李林甫为相既久,自知“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担心有“鬼灾”,遂求助于术士,术士对他说“可于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李林甫“乃于西市招募之,得焉”^{[3]2659}。可见,西市中有“善射者”。开元中,刘生想要知道自己选授官职的事情,“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后来李老所言皆中,还说出了原因,“生大伏焉”^{[3]1656}。类似这样拥有某种特殊技艺的人,大概东、西二市都有。

(三)广泛多样的商业经营对象

唐都长安商业经济发达,几乎任何物品都可能成为商业经营的对象,其大者如土地、房产,其小者如废品,都可买卖。换句话说,在唐都长安,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交易的商品,也没有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经营的产业,做什么生意都能发家致富。据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财,凭借“收人间弃物,积而鬻之”,从而致“家产巨万”。又在金光门外,购得一块布满瓦砾的不毛之地,经过一番整理之后,就在这块地上牧羊、耕种,“所收复致巨万”^{[3]1874-1875}。长安人罗会,其家世代以“剔粪自业”,并因此而致巨富,曾有士人陆景阳在其家止宿,见罗家如此富有,遂问罗会“何为不罢恶事”?大概陆景阳觉得,经营“剔粪”业乃是一种令人恶心的下贱事。罗会却告诉他,自己曾经停废过一两年,但家中连续出现奴婢死亡、牛马失散的情况,而一旦恢复经营此业,一切便又顺风顺水,也许是命运就该这样吧^{[3]1874-1875}。实际上,这则故事隐喻罗会并不以经营“剔粪”业为耻的心态。长安富商窦义经营多个产业皆能赚钱,包括废品收售、树木种植与木材加工出售、麻鞋制作与售卖、蜡烛制作与售卖、土地买卖、房产买卖、店铺经营、玉器加工与经营等。

长安的房产买卖,其例颇多。据载,邢凤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3]2248},此宅院百万成交,价格不菲,而考其房价之所以如此昂贵,或与宅院位于平康里,而平康里又紧挨皇城和长安东市有关^⑩。也有一些房产因地理位置不佳,或因“闹鬼”“凶宅”等因素,只能低价出

售。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永乐里有一处“凶宅”,凡居住者皆破家败业,渐渐地就无人问津了,于是房屋愈加破败,仅存堂厅,院子里长满杂草树木,扶风人苏遏“恹恹遽苦贫穷,知之,乃以贱价,于本主质之,才立契书,未有一钱归主。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3]3218}。可见,即使房屋破败、价格低廉,甚至转手出售,也必须与“本主”签订房产买卖的“契书”。

长安人口极盛时超过百万,由此造成长安的房屋租赁业十分发达。《太平广记》所载赁房而住、租房以居的事情颇为常见,即为明证。这些租赁房屋者,有些是外地商贾,有些是进京的举子和选人。“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醜,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3]2739}“唐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3]1471}这些身份的人相对本地居民较不固定,而且随身财帛有限,当他们无力在长安买房久居的时候,也使得房屋租赁业蓬勃发展起来。另外,长安租赁业发达并不限于房屋租赁一端,但凡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在内,都有相应的租赁市场。例如,长安东市就有专为人们出行提供脚力的租赁行,大概驴、马、车等各种出行工具均可出租。《太平广记》所载“马震亡母赁驴回家”之事,自属荒诞,但所写长安东市有提供驴马租赁的租赁行,以及租赁行中有“赁驴小儿”为租客提供服务并负责收取租赁费用之事,证明长安确实存在专门提供出行服务的租赁行业。

综上所述,《太平广记》所载唐都长安的经济商贸活动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经济意象。长安已经拥有具备雇佣条件的专业性较强的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得到合理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保证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长安集中设置了功能齐全的市,汇聚了各地奇珍异宝与各种能人异士,既使物资有序流通又促进了人们交易的进程;长安允许有纷繁复杂的商业经营对象,不论是廉价物还是不动产,都可以用来经营,体现了人们灵活变通的思想,这些智慧进而催生了城市租赁业。

四、结语

《太平广记》关于唐都长安的各类记载,大多表证着长安繁荣兴旺的经济意象。唐都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它所展现的宏阔气魄是令人神往的,人们在这座城市中进行商品交易与行肆经营,其背后显示了长安拥有逐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皆所积集”的交易市场和广泛多样的商业经营对象。唐代长安

经济是古代城市经济的典型,它的繁荣兴旺体现于唐代长安坊市的严格界限被逐步打破,人们的经济活动也由封闭走向开放,交易形式愈加灵活,从而更能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挖掘历史文献,感受唐人居于长安之“意”,探寻唐都社会经济之“象”,则城市地域中每一个经济元素都会尽显唐代长安的历史变迁,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唐代社会经济特色,体会长安经济意象之生动。

注释:

- ①从文学视角研究“长安意象”的论文较多,主要有:杨颖.晚唐诗歌中的长安意象[J].宜春学院学报,2010(9):122-125;高天成.唐诗中的长安文化符号及其意蕴之美[J].唐都学刊,2011(1):1-4;汪枫.唐诗中的长安意象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1;张建华.唐长安城市意象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泉佑二.日本文学中的“长安”意象——唐文化在日本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张慨.唐代诗画中的长安意象[J].艺术百家,2017(2):169-177.从建筑学视角研究“长安意象”的论文相对较少,如:吕宁兴.唐长安城市审美气象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1;李志红.论长安城的意象之美[J].郑州大学学报,2017(1):19-22.
- ②前人对唐代长安经济的研究成果如:武复兴.唐长安的市场和商业[J].西北大学学报,1985(2):41-43;曹尔琴.唐长安的商人与商业[J].唐史论丛,1987(1):118-136;薛平栓.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及其原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3):89-95;薛平栓.论唐都长安的金融业[J].唐史论丛,2006(1):296-321.
- ③《太平广记》卷452《狐·六》“任氏”条:“既行,及里门,门尚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第3693页)
- ④《太平广记》卷243《治生》“窦义”条引《干馊子》:“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第1877页)
- ⑤《太平广记》卷436《畜兽·三》“张高”条引《续玄怪录》:“牵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第3548页)
- ⑥《太平广记》卷157《定数·十二》“李君”条引《逸史》:“可西市鞦轳行头坐。”(第1130页)
- ⑦《太平广记》卷484《杂传记·一》“李娃传”条引《异闻录》:“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第3987页)
- ⑧《太平广记》卷83《异人·三》“贞元末布衣”条引《潇湘录》:“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第536-537页)

(下转第84页)

此外,户外游戏材料的投放并非多多益善,也不能整齐划一,要根据幼儿户外游戏需求灵活调整,多样化呈现,以契合不同幼儿的发展水平。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指出,越是简朴的玩具,越具有开放性,教育作用越大,它们越能激发幼儿的想象力,扩展幼儿的发散性思维。户外成品与半成品游戏材料投放的比例和自制材料投放的比例也应该根据幼儿年龄适当调整和补充,增加开放性材料的投放。例如,小班可投放木马、小车等成品类高结构材料,作为认知事物的基础;而随着年龄增长,幼儿发散性思维萌芽,想象与表征水平提升,可逐步增加麻绳、树枝、纸盒、套圈等没有固定功能的天然和半成品类材料。结合户外场地宽阔的优势,还可鼓励大班幼儿创造性使用开放性游戏材料,进行多类合作游戏,一物多用。

注释:

①180、20、1 为常数, N 为班数,乳儿班不计。

参考文献:

- [1] 沈海驯,余海军.发达城市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的路径探析——以宁波市为例[J].中国教育学刊,2018(7):17-20.
- [2] 王声平,皮军功,关荆晶.政府发展和管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现状及其改进建议[J].学前教育研究,2018(8):17-27.
- [3] 刘焱.儿童游戏通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646,648.
- [4] 沈建洲.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1,68.
- [5] 李全华.幼儿园环境创设[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3,6.
- [6] 陈鹤琴.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280.
- [7] 王灿明.学前儿童创造力发展与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38-239.

[责任编辑 乡 下]

(上接第41页)

⑨笔者以“通化门”作为检索词汇,在《太平广记》中共搜索得6条史料,除正文所引“奚乐山”条外,其余5条分别为卷203“宋沅”条、卷311“史遂”条、卷328“沙门英禅师”条、卷334“河间刘别驾”条、卷345“裴通远”条。在这几条史料中,除正文所引外,通化门一无例外与“送别”“送客”或出入通化门等行为有关系,且多数可见到与“车”有关的信息。如卷203“宋沅”条云:“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行。”(引《羯鼓录》,第1535—1536页)是写宋沅送客出通化门时迷官蝴蝶好遇到度支使运送货物的车队,于是稍做停留以后,就与客人匆匆告别,随同度支使的车队同行。这则材料表明,唐朝中央度支使司转运货物的车队,可能就是经由通化门进出长安城的。又如卷334“河间刘别驾”条云:“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引《广异记》,第2652页)刘别驾在通化门所遇到的美女是乘车出入的,说明长安城中的富家女性出入长安城游玩时,多数都是乘坐车马的。又如卷345“裴通远”条云:“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于通化门。及归日晚,驰

马骤,至平康北街。”(引《集异记》,第2734页)可见,长安居民有时举家到郊外游玩,多数情况下也是乘坐车辆,且往往经由通化门出入。

⑩平康里位于皇城东南角,其东侧即长安东市。

参考文献:

- [1]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2] 张国风.《太平广记》史话[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1.
- [3] 李昉,徐铉,扈蒙,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4] 郑学檬,杨际平,陈明光,等.中国经济通史:第四卷[M].赵德馨,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689.
- [5] 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宋敏求.长安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7]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M].栗劲,霍存福,王占通,等编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644.

[责任编辑 文 川]